

九

鸦片统制与毒害

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
颂英烈之功勋，扬抗战之精神。
www.krzzjn.com

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
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

www.krzzjh.com

鸦片毒害获得巨额财政收入

卢元善

贩卖鸦片的机构：伪中央设立专卖总署，各省设立专卖署，管专卖行政，署下有批发处，管鸦片批发，到各市县，各市县指定鸦片零卖人，零卖人开设零卖所，供瘾者吸鸦片，或卖烟份与瘾者在自己家中吸用。规定瘾者须到市县警务科卫生股登录，领吸烟证，表面上无吸烟证者，不准吸烟，实际上批发处就私卖烟土，各零卖所，私卖烟份，无吸烟证的人也可以随便出入。并用多数烟妓，引诱无瘾的青年，在零卖所的烟盘上就系着吸烟证，吸烟者可以大胆吸烟，农民到市内卖粮时，也有被引诱到零卖所的。这就是公然贩卖鸦片，制造瘾者的实况。

鸦片的收买数量：烟土起初东土（佳木斯附近产的）有一些，此外都是经日寇三井手，由伊朗买来的“红皮子”烟土，由批发处分配给到各市县零卖所，零卖所掺上料子（假烟土）若干，作出烟份，卖给瘾者。从1934年起，热河被指定为种鸦片区。在热河强制农民种植鸦片，约54万亩，每亩强制收买15两，预定共收入800万两，收买价格每两2元。由伊朗买200万两，单价每两约4元。又和朝鲜日本总督府定契约，每年买200万两，单价每两约4元。在沈阳东关大东区，设立专卖工厂，用鸦片制造吗啡，剩的渣滓，掺合豆面白面等，密制料子，每两价格5分钱，配给瘾者的鸦片中，就有这种料子二成。

配给鸦片的数量和收益：1935~1936年鸦片瘾者登录的数

约60万人，每人每年预定配给20两，共1200万两（其中纯鸦片960万两，料子240万两，每两配给价格8元，共为9600万元），除收买鸦片及料子原价与杂费等，纯益约5000万元以上。

卖吗啡：1937年夏，古海忠之正当主计处长，颁布禁烟法。当时我当龙江省民生厅长，民生部禁烟科长近森某，来到龙江省，说中央成立禁烟委员会，以总务厅次长谷次亨为委员长，决定从今年起，鸦片十年断禁，现在已经登录的瘾者约60万人以外，不再登录了。但是全国扎吗啡的人，预测约有2万人，今后配给吗啡，使吗啡瘾者登录。各省成立戒烟所，收容愿戒烟的人。龙江省在昂昂溪成立戒烟所一处，没能收容瘾者一人。

1938年夏，我被任命为专卖总局长，这一年鸦片的收买数量：伪满热河种鸦片54万亩，一亩规定收买15两，共为800万两，实际每年收买数量，不能达到预定数量，1938年实际收买650万两，由朝鲜买200万两，经三井洋行由伊朗买200万两，由山西买来130万两，共为1180万两。

鸦片的配给量：全伪满登录瘾者60万人，每人每年配给20两，掺料子的鸦片，需1200万两，内纯鸦片960万两，二成料子240万两，净余纯鸦片220万两，为制吗啡用200万两，其余20万两，为预备用，流于秘密贩卖（如警察、特务、日寇宪兵队、特务机关都有私烟馆）。

鸦片的收买价格：热河农民的650万两，每两2元钱，为1300万元，其他的530万两，买价一两4元钱（大连三井运来的伊朗鸦片一两3.8元），为2120万元，料子每两价格5分钱，240万两，为12万元，以上共为3432万元。

鸦片的专卖价格：配给瘾者价格，每两8元钱，1200万两，共收入为9600万元，去掉收卖价格与料子价格3432万元，净纯益金6168万元，以上是表面上的利益。至于200万两纯鸦片

制造吗啡约67万两，每两40元（伪满配给价），计算为2680万元；剩余的20万两纯鸦片，加上料子二成，私卖给配给价格一倍，为384万元以上，共为9232万元，完全是剥削农民及瘾者的利益。

奉天专卖工厂：1938年秋，烟政科长天野作藏，引导我们到奉天专卖工厂视察。厂内一个工厂密制吗啡，本年原料纯鸦片200万两，制成约67万两吗啡，当时全伪满吗啡瘾者2万人，每人每年配给约9两（每日一瓦），共为18万两，剩余的啡，均属秘密处理，推想为日本军用或流入华北。又一个工厂，密制料子，用多数大型蒸汽双底锅，日夜不停，作以豆麦面粉掺上啡的渣滓，作成像烟土一样，包装起来，拿到制烟份工厂。制烟份工厂，用机械把纯烟土切去二成，掺上料子二成，用机器混合后，作烟份小包，一个烟份约二分烟。这个工厂，用工人约2000人，都是中国人，妇女极多，啡料子工厂，技师、工人都是日本人。这个工厂，还不够用，已经预备增建一倍，地基已经打成，预定建成后，作料子，把鸦片内掺加料子三成以上，啡也多制造，又计划烟份改作烟膏，增加收入，以上都是我任内通过的计划。

设禁烟总局：1940年古海忠之当经济部次长时，把专卖总局内的烟政科，扩大为禁烟总局，在民生部管下，局长是袁庆廉，副局长是冈田文雄。各省市县取消零卖所，设立官办的管烟所，直接卖鸦片烟份和啡锭。又藉设收容愿戒鸦片戒啡的人，把各市县有名无实的戒烟所，改名为康生院，但是入康生院的瘾者，寥寥无几。1941年秋，由禁烟总局命令，全伪满各省市县鸦片瘾者及啡瘾者再登录，还说是为瘾者戒鸦片戒啡打算，实在是欺人的话，明明是要多制造瘾者，制造财源。再登录瘾者的结果，佳木斯市原有瘾者3000名，增加三分之

一，到约4 500名，照这个比例，全伪满1937年的登录瘾者为60万人，不但没减少，又添上三分之一，应为80万人。这时鸦片的配给价格，每两20元，料子掺到五成，仍照每一瘾者每年配给20两，能收入32 000万元，去原本约3 000万元，净余29 000万元。

扩大种鸦片区域：1943年，古海忠之当总务厅次长，操纵伪满经济大权，扩大鸦片栽种区域，除热河省外，指定奉天、四平、吉林三省，也栽种鸦片。成立鸦片生产组合中央会，理事长是海村圆次郎，组合是包种的性质，1944年每一个组合，约3 000亩，15个组合，就有4.5万亩，每亩按15两计算，可收入67.5万两。鸦片生产组合，在乡下挂上鸦片生产组合的招牌，强租民地，收割鸦片时，动员民间妇女学生。沈阳东杨官屯，被组合强租20垧地，收割鸦片时，动员该屯60家农民的妇女、学生，说是勤劳奉仕。1945年春，撤销禁烟总局，改设禁烟协会，理事长植树某，副理事长刘绍衣，改成为半官半私性质，目的是为容易对鸦片的处分。这时鸦片在热河产的，仍是预定800万两，奉天、四平、吉林和开鲁产的，共约100万两（开鲁在1941年海村圆次郎当兴安西省次长时就开始栽种），由朝鲜买200万两，合计收买的鸦片1 100万两，加上料子共为2 200万两，登录瘾者80万人，配给量照前一样，每人每年20两，共为1 600万两，剩余的600万两，运到上海、北京去换物品，危害中国人民（古海亲口对人说过在上海拿鸦片换布的话）。

古海忠之为掠夺侵略资金，自伪满成立，即参与公开贩卖鸦片计划，用强制栽种鸦片，强制收买等手段，剥削广大农民，并密制吗啡，贩卖吗啡，加深毒害人民。密制料子，卖假鸦片，使瘾者受双重剥削。伪满十年断禁，变名禁烟总局，都是花招，欺骗世人。最后变本加厉，使瘾者再登录，企图公开增加瘾者，

扩大栽种鸦片区域，预备大量生产。废止禁烟总局，设立禁烟协会，预备大量输出到中国中原。这种毒害人民的鸦片政策，自始至终是古海参加主张计划的。其恶果，不仅使鸦片瘾者自身中毒，已成废人，累及全家破产。据齐齐哈尔市调查，齐齐哈尔市内，鸦片吗啡瘾者，有八成倾家败产的。

鸦片毒害政策的双重作用

谷次亨

关于“鸦片断禁政策”，是武部六藏的前任星野直树制定的，而武部到任后继续加以推行的。

1938年2月，在伪“总务厅”内成立了“鸦片断禁委员会”，决定以逐年减少吸烟量为方针，规定十年为“断禁”年限，并指定热河省为“栽烟地区”。

1939年秋，与“鸦片麻药断禁法”公布同时，在伪“民生部”机构内添设了“禁烟总局”，解散了“鸦片断禁委员会”。由此以后，关于“禁烟”一切方针、计划都归于伪总务厅企划局执掌。

当时，由该“禁烟总局”调查与审定的全伪满瘾者数目为82万人（包括所谓“兴安地区”即蒙古区域内的瘾者约20万）和必需的吸烟量为300万两，虽然不够（约制200万两），瘾者尚可仰赖外来的走私烟（由关东州、北朝鲜方面）补充之。这是当时的伪“禁烟总局”副局长梅本所报告的“断禁政策”的表面情况。

1941年底，武部到任后，借口以前已经登录的62万（“兴安地区”20万除外）瘾者之外，还能有未登录的瘾者，必须再调查、登录。如瘾者增加，就必须增加栽培面积，特指令由昌图到海城铁路沿线一带的好地为增加栽培区域。

武部未到任以前，在收购烟土方面的情况是：热河鸦片年产量平均500多万两，种烟户每两卖4元伪国币才能够本，而“政府”委托的“大满公司”（专收购鸦片的组织）却定为每两2元，种烟户因亏本不愿出卖，日伪当局就用尽种种非法手段，每年才只能平均收购到400万两上下，除去制药用100万两外，其余300万两是供给全东北瘾者吸用的。

由于武部来任后更增加了栽培面积，并授意成立“裕东公司”，以伪国币4元的价格暗行收买了热河烟户私存的烟土，同时烟户们在日伪当局的默认之下，也扩充了栽培面积。由此，热河年产量平均650余万两，但每年平均只能收购到550余万两，100万两制药用外，其余450余万两供给瘾者吸用了。上述“裕东公司”由1941年起，每年热河烟户私存的烟土和增加“区域”所产的烟土（约1300两以上）一并收购，全部走私到华北，交给日本“三井”系统的商行，以每两20至40元的高价倾销给沦陷地区内的中国人吸用。

这些都是根据1943年伪“总务厅企划局”担当“企划鸦片”的“参事官”日本人津末挂和已被解散的“满洲劳工协会”的“理事”日本人饭岛二人先后透露出来的。

以每两4元伪国币在东北收购的烟土，到华北即可卖20元至40元，每两平均按照30元来计算，1000万两就是3亿元。武部用这笔巨款，每年由华北购买大量优质的炼铁用煤（开滦矿煤）、大量的工业用盐、大量的席子（包装用），供给日军战时最感缺乏的军需物资，用这些物资制造出来的军火，再拿到中

国来大量地屠杀中国人民。

这个事实，在1943年夏季召开的伪“省次长”恳谈会议席上，古海曾赞美武部“总务长官”的经济、政治手腕的高明时说：“用‘满洲国’出产的便宜烟土，走私到华北卖得了意外的好价，以此为‘祖国’今年又购买了开滦矿煤90万吨、大量的盐、大量的席子等，使‘祖国’在战时中必需的物资，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啦！”等语引以为自夸。

武部以利用“鸦片断禁政策”为名，一面毒害中国人民；一面由此获取最高利润，以供给日本侵略战争，这不但破坏了国际公约，而且是违反人道的行为。

鸦片专卖与毒害

曲秉善

一、鸦片专卖与毒害政策开始情况

伪满洲国对鸦片实行专卖，大开烟禁，用鸦片和吗啡毒害中国人民的政策，早在1932年秋就着手计划，于1933年初开始实施的。这个鸦片毒害政策，是由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次长阪谷希一、伪财政部总务司长星野直树、伪民政部总务司长竹内德亥和其他日系官吏共同策划的，决定尽快在伪满实行鸦片专卖，设立专卖公署，指定鸦片零卖人，在各地设立了大量的鸦片零卖所，公开出售鸦片和吗啡，任人购买吸食或注射；公布了鸦片专卖法，由伪满财政部外局专卖总署专卖鸦片；指定鸦片总批发人，指定吴子清为北满鸦片总

批发人，大中银行经理孙某为南满鸦片总批发人，他们在各都市设立批发所；批卖给鸦片零卖所从专卖总署批买的鸦片，由伪满民政部指定鸦片零卖人，许可其设立鸦片零卖所售卖鸦片和吗啡。伪满民政部总务司长竹内德亥为了进行对中国人民的毒害，特从旅大日本关东厅找来黑井技正，从台湾找来丹野技正，配属在伪满民政部卫生司内，使他们根据其在旅大和台湾毒害中国人民的经验来计划施行伪满的鸦片毒害政策。规定由伪满民生部卫生司主管关于鸦片毒害政策的企划与实施事项，由伪满民生部警务司主管关于鸦片毒害政策施行上的取缔事项，由伪满各省市县的警备厅卫生科或保安科、卫生厅、卫生处、卫生科、警察局、警务科主管推行鸦片毒害政策，关于鸦片零卖人的指定和鸦片零卖所的许可，由各市县根据伪满民政部的规定按照地方情况，经由省报请伪满民政部认可。当时鸦片的来源，一部分是输入的印度大头土，大部分是指定在东北的东北部边境地区栽种罂粟，大量生产鸦片。在1933年全东北各都市城镇都出现了挂有鸦片零卖所招牌售卖鸦片和吗啡公开供客的场所，据我所看见的长春市就有四处鸦片零卖所。当时鸦片专卖的收入每年有3 000多万元伪币。

日寇在东北实行了鸦片毒害政策，我认为其目的有二：一个目的是为了增加岁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伪满后，首先遇到的困难问题，就是岁收不够支出，必须急于找到巨额的岁收财源，他们把实行鸦片专卖设立鸦片零卖所公开售卖鸦片和吗啡的办法，视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良策，所以他们要立即实施鸦片毒害政策；另一个目的就是，他们妄想用杀人不见血的鸦片毒害手段，使中国人民亡国、灭种，使东北和全中国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当时我是在伪满民政部总务司当文书科长，我曾听伪满民政部总务司长竹内德亥说过，在军阀统治东北时，

拿吸食鸦片者不当人，使他们得不到良好的鸦片，危害他们的健康，对于一般吸食鸦片者严厉取缔惩罚，而军阀们自己却公然贩卖鸦片吸食鸦片。伪满则不然，伪满是所谓王道国家，对于吸食鸦片者一律当人看，注意他们的健康，给他们预备随时都能以廉价吸到良好鸦片的设施。竹内德亥的话，充分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用鸦片和吗啡毒害中国人民，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阴谋。

二、鸦片毒害政策的实施过程和一切情况

各地的鸦片零卖所在设立不久，不约而同地都添设了女子烧烟引诱顾客，而负取缔责任的伪满警察机关，对之成为公开的默许。在1933年我曾到长春头道沟鸦片零卖所看过，一所两层大楼的前后屋都间壁成了无数的大小屋，每个屋里都挤满了人在吸食鸦片，许多烧烟的女子穿夹在各屋里，一共约有400多顾客，其中仅有一小部分是鸦片瘾者，大部分是健康人被引诱而去冶游者。

1933年伪满民政部卫生司在奉天设立一个戒烟所，免费给鸦片和吗啡中毒者戒烟，以后又在其他大都市设立了戒烟所。这些戒烟所由伪满民政部卫生司直接监督指导。在最初成立戒烟所时，伪满民政部总务司长竹内德亥曾说过，从设立戒烟所足以说明他们实施的鸦片毒害政策，乃是为了普及鸦片，不是为了戒除鸦片。竹内德亥的话充分说明了设立戒烟所的目的，乃是给日伪统治者实施的鸦片毒害政策做掩护。戒烟所的设备非常简陋，对病人每天只给吃不饱的稀粥喝，并且日本人经常对病人殴打辱骂，因而没有人去戒烟，各地的戒烟所完全成为与设立的本来目的相符的空有设施。

1934年开始在热河栽种罂粟，以后就拿东北部边境地区治

安不好为藉口指定热河全省为罂粟栽种区取消在其他地区栽种罂粟，而在实际上东北部边境地区和兴安省内仍然继续栽种罂粟，全热河省内栽种罂粟的面积达60多万亩。对于鸦片的收买由伪满专卖总署委托日本人组织的大满公司为收买机关，收买价格每两平均1元伪币，比私价低数倍，并且每亩强收15两鸦片，使种罂粟的人民遭受严重的损失。热河每在收烟期，大满公司的收烟人对种罂粟户的惨无人道的勒索逼迫传遍全东北，听说他们每到一户，都是翻箱倒柜，甚至扒炕找隐藏的鸦片，殴打辱骂逼索鸦片，逼得种罂粟户无法应付，而有上吊自尽者。

1934年在奉天东关设立了一个大规模的制造鸦片烟膏和吗啡的鸦片制造厂，伪满专卖总署所贩卖的鸦片和吗啡都是在那里制造的。这个制造厂最初隶属于伪满财政部，以后隶属于伪满禁烟总局，鸦片总批发人在1934年就取消了，从此以后，各地鸦片零卖所直接由各地的伪满专卖署贩卖鸦片和吗啡售卖。

1938年是星野直树当伪满总务厅总务长官的第二年，也是古海忠之从伪满总务厅主计处长转到伪满总务厅企划处长的那一年，他们给在逐步加强实施的鸦片毒害政策，穿上了鸦片十年断禁政策的外衣，借以欺骗人民的舆论，来进行他们更进一步加强毒害中国人民的阴谋。当年春在伪满总务厅内设立了禁烟促进委员会，由伪满总务厅总务长官星野直树当委员长，古海忠之及伪满各部次长、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总务部长、实践部长、伪满新京特别市长等都是委员，委员会下设有干事会，由伪满总务厅次长谷次亨担当干事长。并制定了鸦片十年断禁实施要纲，决定从1938年起十年间为鸦片断禁期限，断绝鸦片和吗啡瘾者，实行鸦片和吗啡瘾者登录制，发给鸦片瘾者和吗啡瘾者吸食证，除了特别年老和有疾病者准许在家吸食鸦片外，其余瘾者都必须持票到鸦片零卖所按需用量吸食鸦片，禁止鸦片

零卖所设女烧烟者，扩充戒烟所，按年计划给鸦片和吗啡瘾者戒烟。遂在1939年成立了伪满民生部外局禁烟总局，停止了伪满专卖总局的鸦片的专卖，改由伪满禁烟总局生产和贩卖；将伪满民生部保健司主管的关于鸦片毒害政策的行政和企划移归伪满禁烟总局主管；并将奉天制造鸦片烟膏和吗啡的鸦片制造厂和各地的戒烟所都移归禁烟总局管辖。这一连串的措施伪满政府都宣传说是为了要实现断禁鸦片，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从一切事实都证明是拿所谓鸦片十年断禁政策做掩幕来加强鸦片毒害政策。在伪满禁烟总局成立后，由全伪满市县的保健处、保健科、警察局警务科根据伪满禁烟总局指示实行了鸦片瘾者和吗啡瘾者的登录。当时受登录的鸦片瘾者有60万人，吗啡瘾者有2万人。伪满禁烟总局把鸦片零卖人取消，将鸦片零卖所改为管烟所，由市县直接经营。管烟所的管理人都是市县的官吏，以后将戒烟所改称为康生院，其内容仍然与过去一样。1943年伪满四省省内的管烟所有100多处。与鸦片零卖所改为管烟所归市县直营的同时，各大都市的私烟馆就大量增加了，这些私烟馆都是日本特务机关日本宪兵和伪满警察特务开的。我听于元善说，在佳木斯市日本特务机关日本宪兵队和伪满警察特务各开有四五处。对于鸦片的生产和收买，在伪满禁烟总局成立后，取消了大满公司的代理收买，实行了组合制，使种罂粟户组织起来，结成鸦片生产组合。每个组合里都加入与土地毫无关系的日本人，当组合长和其他名目。实行监督与指导组合，各县的鸦片生产组合联合在一起，成为鸦片生产组合地方会。地方会联合起来，成为鸦片生产组合中央会。伪满禁烟总局就通过这组合组织，来支配各地生产鸦片和收买鸦片。关于地方的鸦片行政机构，在1940年伪满热河省公署内新设了禁烟厅，各大都市的市公署内新设了管烟科，以强化鸦片行政，实际就是为

了强化鸦片毒害政策。

1941年伪满禁烟总局以揭露潜在鸦片瘾者为名，实行鸦片瘾者再登录，结果受登录者增加为90万人。遂以鸦片的生产量不够需要为借口，在1943年又新指定吉林省、四平省及奉天省为种烟区。四平省就从这年开始种了250亩菜园子地的罂粟，在梨树县成立了一个鸦片生产组合，在开原县成立了两个鸦片生产组合。1944年春伪满禁烟总局副局长梅本四郎到四平省公署，要求追加种罂粟面积，被省拒绝了。从梅本四郎的口中知道了伪满是将鸦片大量向华北华中及南洋方面输出，换取各种物资。

1945年3月伪满实行中央机构改革，取消了禁烟总局，在厚生部设禁烟司，同时成立了鸦片断禁协会，伪满厚生部禁烟司掌管以前禁烟总局的一切主管事项。

三、鸦片毒害政策的最后结果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实行了14年鸦片毒害政策，使无数的健康人都变成了鸦片中毒者和吗啡中毒者。仅就1941年伪满对鸦片瘾者实行再登录时，发表的人数就有90万人，而实际未能登录者尚不知有多少人。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则实际中毒人数，必增加为相当大的惊人数字，并且受害者不仅限于老年者和壮年者，也深入了青年层。我在1944年四平市的所谓国兵检查场里，就发现了百人之中有两人是鸦片中毒者。鸦片毒害政策使无数的中国人民遭受巨大损失、倾家破产、疾病死亡，这些损失都计算起来，实是一个不能估计的惊人数字，而日本帝国主义通过这个鸦片毒害政策从中国人民掠夺的财富作为伪满岁收的主要财源之一。

伪吉林省鸦片毒害状况

黄富俊

伪满政府于1937年，实行鸦片断禁，在伪满各地开设官烟馆，令瘾者领取吸烟证，在官烟馆吸烟。全国瘾者约60万人，共需鸦片500万两。因此，我令吉林省各市、县、旗开设官烟馆千余家，令瘾者领烟证吸烟，全省瘾者计有4万余人。当时伪满在热河种鸦片，每年出口100万两，制药用100万两外，余300万两不敷所用，尚缺200万两。所以都高价私买由旅大、朝鲜和伪满各地私种的鸦片，因此，受到罚打者也很多。吉林省各市、县、旗所分配的鸦片不敷所用，并且管鸦片的和官烟馆作弊，将鸦片掺假者不能顶瘾，又不得以高价私买，因此，多有受到处罚者。除已有吸烟证的瘾者外，又有瘾者出现，如此在1941年又令瘾者再登录，吉林省再登录的瘾者，又增加了数千人，他们都因鸦片不足，私买高价鸦片，因此，又多有受到处罚的，像这样不合情理的事情屡次出现，瘾者多有陷于贫困，流离失所的。省内设立禁烟者的康生病院，这个康生院之设，虽说是为瘾者禁烟，却是有名无实，不是彻底为瘾者禁烟，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办法。

鸦片的栽种与收购

卢元善

热河收买鸦片的情形：热河鸦片，在1934年—1935年期间，热河专卖署不直接收买农民的鸦片，组织了一个包收鸦片的公司，叫“大满号”。专卖署设缉私队防止鸦片走私，从1936年取消“大满号”，热河专卖署直接收买。专卖署有缉私队约500人，并联合省县协助监督逼迫收买。对烟农规定的一亩地收15两，达不到量时，受缉私队或县警察逼迫殴打，村屯长负连带责任，挨打的亦不少。

我执行鸦片政策人民所受的灾难：伪满初期开始卖鸦片时，设零卖所，无吸烟证，可以随便出入、吸饮，且设女招待，引诱良民。卖粮的农民，多被坑陷，把瘾者造成以后，每年每人配给量20两，不够过瘾，就私买鸦片，价格一倍以上。据民生厅调查，鸦片瘾者十分之八倾家败产，最后堕落于扎吗啡，至于死亡而后已。人民陷入瘾者，他本身已成废人，连累其家，倾家败产。国家的单位家庭败亡，国家必至灭亡。前清鸦片战争，正是英帝国主义，以鸦片灭亡我祖国的前例。人民既陷入瘾者，终至扎吗啡，卖妻卖子，是人道所不容。报载鄂伦春民族，“九·一八”前人口4 000人，因伪满时日寇大量流毒鸦片，到“八·一五”仅剩900人。

伪满在热河种鸦片的理由：伪满自1934年在热河种鸦片，别省不许种，其用意所在：（1）热河土地瘠薄，不生产粮食使专种鸦片，留他省为日寇的食粮与工业用农产品的基地。（2）旧

汤玉麟时代，农民有种鸡片的经验。(3)热河为伪满西南国境，使种鸦片，不生产粮食，断绝抗日军的粮道，如此使热河人民，也不能得到足够的吃粮。

鸦片瘾者再登录：1941年春，伪满中央民生部禁烟总局来命令，鸦片瘾者再登录。1937年的伪满伪装鸦片十年断禁时，登录瘾者全伪满60万人。若真断禁，就无再登录的必要，这次命令再登录，明明是制造瘾者，使瘾者再增多以贩卖更多鸦片。佳木斯原有瘾者3000人，再登录的结果，添了三分之一，到4500人。

伪满洲国的鸦片政策

李作权

一、伪满洲国的鸦片统制

伪满洲国建立后，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有关鸦片问题的法令，逐步实施鸦片统制政策，即对鸦片实行了垄断的政策。

在1932年9月16日公布了“暂行鸦片收买法”，设“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为实行鸦片的专卖制度做准备。同年11月3日，公布了专卖公署的官制，成立了公署，掌握鸦片的专卖，进行对鸦片的统制。

1932年11月30日，公布“鸦片法”及“鸦片法施行令”；1933年（大同2年）1月6日公布“关于鸦片法施行日期之件”，规定“鸦片法”自大同2年1月11日施行。该法共计二十二条。其中第二条：“鸦片不准吸食，但已成年而有瘾在救治上有必要者不

在此限”；第三条：“出售鸦片以及制造鸦片烟膏与药用鸦片，均由政府专行之……”；第四条：“鸦片或吸食鸦片器具，均不得私行输入或输出……”；第五条：“鸦片或供吸食鸦片之器具，除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并依命令所规定者外，不得私行制造买卖授受所有或持有之”；第六条：“零卖鸦片人不得将专卖官署所售之鸦片烟膏加工或混和他物而贩卖或让与”；第七条：“不得意图营利而供与他人吸食鸦片之处所或设备……”；第八条：“非经政府之批准，不得以制造鸦片或其代用品为目的而栽种罂粟”；第九条：“不得以前条之目的买卖或授受罂粟种子”；第十条：“经政府批准之栽种罂粟人，所生产的生鸦片，以缴纳于政府，但暂时得卖交由政府指定之收买鸦片人，收买鸦片人所收买之生鸦片缴纳于政府”。在该法中对违反者并规定了处罚办法，最高者处以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5000元以下的罚款，但徒刑和罚金还可以并科。

“鸦片法”实际上是鸦片的统制法，它对鸦片的生产及流通过程，都做出了严格的统制规定，建立起来鸦片由政府进行专卖的制度。而在“鸦片法施行令”中，对有关问题又做了更为详细的规定，使罂粟的种植、鸦片的收购、制造以及销售，完全操在专卖总署之手。伪满政权对鸦片实行了严格的统制。

(1) 罂粟种植的统制

“鸦片法”和“鸦片法施行令”，对罂粟的种植做了统制的规定，即种植罂粟者，必须得到政府批准，否则不得私行种植。“鸦片法”第八条规定：“非经政府之批准不得以制造鸦片或其代用品为目的而栽种罂粟”。在“鸦片法施行令”中则做了更具体的规定，其中第十二条“栽种罂粟区域及其面积，每年由专卖总署长定之”；第十三条：“欲栽种罂粟者应开具左列事项，每年呈请该管省长批准，其有变更或废止时亦同。（一）住所、姓

名、生年月日。(二)栽种地址、面积”。

罂粟的栽植完全由政府控制，伪满政府于每年10月份制定下年度栽种计划，下达给有关的省长，省长将计划再分配给各县、旗，县、旗于年末到次年2月末，审理农民提出的栽培申请。农民按上述要求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才能允许栽种，并于地旁树立标木，记载地址、面积、栽种人之住所、姓名等，以便检查。对未经批准而进行栽种者，则加以取缔。据日伪的统计，从1934年到1943年对未经许可而进行罂粟栽种者，共查出、割除267 897陌，平均每年26 789.7陌，其中1935年高达105 000陌。

为了保证鸦片的统制，取缔官员（缉私官员）和军警共同到各地检查，甚至利用飞机检查，如发现有私自种植者，立即给予割除。

(2) 统一收购

罂粟的栽种者所收获的鸦片，不能随便自由出售，必须出卖给伪满指定的收购人。根据“鸦片法施行令”第十五条规定：“栽种罂粟人应于该管省长指定期日以前，将其生产鸦片数量分别汇报该管省长及专卖总局长”；第十六条：“栽种罂粟人应将其生产之生鸦片，提出于该管专卖总局长指定之期间及处所，或卖与收买鸦片人”。罂粟种植者必须将其收获的鸦片，出卖给专卖总局长指定的收买人。而欲收买鸦片者必须得到官府的批准。如伪满主要鸦片产地热河省，1933年是由当地专卖分署长指定的商人，到产地进行收购。从1934年开始，由鸦片专卖总署指定的收买人（大满号），在各地设立7所分号，110个集货所，进行鸦片的收购；1939年以后又通过农事合作社进行收购；随后在县（旗）成立了“鸦片纳入组合”，即鸦片收缴合作社，专门进行鸦片的收购。在省里成立了“鸦片纳入组合联络部”，统辖全省各县旗的“鸦片纳入组合”。而兴安西省则和热河省有所不

同，最初就是由县（旗）直接收购。

伪满时期收购鸦片，在奉天曾设立了两个大烟土庄，即大满号和大东号。它们在各地又建立了分所，负责收购鸦片的业务。大满号专门收购西部地区生产的鸦片，而大东号则主要在东部地区进行收购。收购的时间，伪满政府规定从6月20日开始，到10月末止，但一般在8月中旬就多数收购完了。

由以上可见，鸦片的收购，是由伪满政府当局或指定专人或机构来进行的，其他人则严禁收购。县旗所收购的鸦片，统一送交奉天的鸦片工厂。

（3）集中生产

伪满政府将收购的鸦片原料，统一送交设在奉天小东边门的大型鸦片制造工厂进行加工。该厂内除厂长、副厂长及职员百余人外，还雇佣女工三四百，从事生产生、熟鸦片。产品由鸦片专卖署的生产科售给各市县的鸦片零售所。

奉天鸦片制造工厂1944年烟膏的生产能力为500万两，另外还生产麻药（吗啡、海洛因）4吨。

此外，还在有的市县设立了分厂或烟膏制造所。

由于鸦片由统一的工厂进行制造，也保证了品质和规格的统一，即所谓官制烟膏（官土）。

（4）鸦片专卖

鸦片制造工厂生产的生熟鸦片，统由专卖总署生产科按情况配售给各市、县、旗指定的鸦片零售人进行零售。零售鸦片人由该管省长指定之，否则不准经营。在伪满初期，由伪满各级政府指定一些私人经营的零卖所，实际即大烟馆。这些烟馆公署发给许可证，在指定的地区进行营业，从鸦片工厂领来生熟鸦片，零售给瘾者。1937年时私营零卖所约有2000个，到1938年，将私营鸦片零卖所改成由市县旗公营的管烟所。1938

年公营管烟所有1430个，1939年公营管烟所有1612个。而从1940年开始，管烟所又由公营变为官营，并入地方行政机构之中，每个市县（旗）都设有管烟所。全伪满洲国1940年有官营管烟所1686所，1941年有官营管烟所1631所，1942年有官营管烟所1579所。管烟所遍布了东北各城镇。伪满洲国的鸦片零售由私营零卖所至公营管烟所，最后又由公营变为官营，将鸦片私卖变成官卖，说明对鸦片的统制步步加紧，统制越来越严厉。

鸦片瘾者必须登记，领取证明书。“鸦片法施行令”规定吸食鸦片人应携带由该管警察官署长发给之证明书，吸食鸦片人非提示前条之证明书不得受让烟片或供吸食鸦片之器具。鸦片的瘾者，必须凭该管警察官署长发给的证明书，管烟所才能出售鸦片。伪满政府通过鸦片瘾者的登记掌握吸食鸦片的情况，这是实行鸦片统制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

（5）鸦片缉私

为了保证鸦片统制政策的实施，伪满当局实行了鸦片“缉私”。1933年1月制定了“鸦片缉私法”。同时又发布了“查获私土奖励规则”。在鸦片专卖总署下设取缔科，于专卖署设缉私科，缉私科的官员一方面到所属各地罂粟种植地及鸦片零卖所进行缉查活动，一方面和警察、税关相互配合，缉查鸦片私行输入输出及贩卖。1940年设置禁烟总局。有的地方烟政职员付给了司法警察权，1942年1月于禁烟总局设置专门取缔官员计366人，配置在重点地方，协助地方进行缉私活动。缉私所获鸦片，一律没收，只对检查者给以奖励，奖励金高达收购价格的50%。据日伪统治当局统计，从1933年到1943年9月，不到十一年的时间里，鸦片缉私的件数为152339件，没收的鸦片数量为2435.445两，平均每年为13849件，221.404两。

二、鸦片统制的目的是掠夺民财

帝国主义者利用鸦片进行掠夺，在近现代历史上已是一种重要的手段，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伪满洲国鸦片统制的目的就在于掠夺民财，增加财政收入。鸦片买卖的收入，在伪满洲国的财政收入中，占着一定的地位。

日伪统治者以低价收购鸦片，又以高价售出，因而获得大量利润。按纯度90%以上，1936年以前列为一等，收购价格：1933年为1.00元，1934年为1.05元；从1937年以后则列为特等，收购价格：1937年为1.30元，1944年上涨到2.00元，1945年为2.40元，13年中增长率为140%。而销售价格增长更大一些，1933年每两为40元，到1945年则为150元，增长率为275%。从收购价格与销售价格的差额看，1933年收购价格每两最高为1.05元，而零售价格则每两达到40元，利润可达4000%。到1945年收购价格每两为2.4元，而零售价格每两则达150元，竟获60倍以上的高利。尽管鸦片收购之后，需经加工生产，减除耗损，但其获利仍是非常之高的。

日伪统治者为了获取大量财富，不仅在东北境内买卖，而且将大量鸦片送往关内各地和日本国内。据某汉奸检举，1941年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亲自将50万两鸦片送往日本国内，以后每年送往日本国内的有增无减。同年古海忠之又将一千数百万两鸦片秘密输至华北“三井”系统的商行。1944年又经古海忠之售给南京伪国民政府鸦片30万两，每两为50元。同年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出售给德国希特勒政府鸦片60万两。

日伪统治者正是由于经营鸦片，以及鸦片税收、私土的没收等等，获得高额利润，使鸦片的收入，每年均在其财政收入中，占一定比例。如1932年，鸦片纯收入370 000元，占伪满

全国收入的0.2%，1934年增至5 465 000元，占全国收入的2.6%，1937年增至2 648 000元，占伪满总收入的8.5%，1939年鸦片的收入达到33 932 000元，占全伪满财政收入的5.6%，占专卖税的50%，到1940年鸦片收入已达1.26多亿元。鸦片已成为日伪统治者掠夺人民财富、增加其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财源枯竭，则鸦片的收入更加有重要作用。

三、鸦片断禁政策

1937年10月12日，日伪统治者决定了《鸦片麻醉断禁方策要纲》，这是伪满洲国关于鸦片断禁的指导性纲领。提出要从1938年开始，10年内断禁烟毒。当然，日本帝国主义是从殖民统治的需要出发，但这一措施，却在客观上符合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这一“要纲”的出笼，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密切联系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变东北为其殖民地。为了巩固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实行法西斯政治统治，武装镇压，垄断东北经济。到1937年，根据日伪统治者的说法，“整備”时期已经完成，进入了所谓“繁荣”时期。即日伪统治者认为它们在东北的法西斯统治已确立，大规模经济掠夺的准备已完成。而有计划的掠夺东北物资资源，变东北为日本侵略者的可靠的战争物资供应基地，是它制定各种政策的出发点。鸦片断禁方策要纲，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提出来的。

伪满洲国时期的鸦片断禁，据日本侵略者的宣传，是依据日本统治台湾实行的鸦片政策，采取的是逐渐断禁的政策。在“要纲”中指出，采取防止新瘾者的发生，对现有瘾者尤其是青壮年瘾者加紧矫治，期望从1938年开始10年中逐步根除。

从“要纲”的内容来看：(1) 实行“禁烟教化”，将禁烟做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内容之一，利用各种手段进行禁烟的宣传。(2) 防止新瘾者的出现，对年满25周岁以下的青少年禁发吸烟许可证；对现有瘾者进行调查，确立瘾者登录制，未登记者严禁吸食；对外来的瘾者禁止进入国内。(3) 鸦片瘾者的矫治，着重于青壮年，取消私营零卖所改为公营管烟所；另一方面规定了鸦片生产及收购制度等等；最后规定了官公职员、军人、特殊会社职员及学生严禁吸食鸦片，吸食者则被开除。

在“鸦片法”中，只笼统的提出了鸦片不准吸食。而这一“要纲”的提出，说明了伪满洲国在鸦片断禁政策上前进了一步。为与断禁措施相适应，行政机构也进行了改革。1940年于民生部内设立了禁烟总局，代替了过去的专卖总局，掌管鸦片的统制和禁烟。同时将公营管烟所改为官营。将国营戒烟所改名为康生院。戒烟所于1933年就在新京、奉天、吉林、齐齐哈尔、承德设立了5所，1934年又增加了5所。到1940年改康生院时除新京和承德仍为国立外，其余改为地方经营，要求各省有省立康生院，市、县旗有市、县旗立康生院，1941年共有康生院189个，收容12 370人，1942年康生院增至200个，矫治者人数为196 314人。康生院对瘾者的矫治，最初采取的办法不一样，1943年由药剂师山口丰一和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正山胜合作研制出一种戒烟剂，伪满政府以100万元收买了这药的专利权，伪民生部大臣于静远将它命名为“东光剂”，从此，康生院以此剂进行矫治。

禁烟总局成立后，于热河和兴安总省民政厅内设烟政科，其他省设保健科，在新京、奉天、哈尔滨等市设烟政科，在各市县的行政科内设禁烟股。到1943年伪满又设立了鸦片断禁协会，1945年又撤销了禁烟总局，于厚生部内设立禁烟司，专门

掌握有关鸦片断禁和鸦片统制的事务。

1938年1月21日，伪中央和地方（省市县）成立了禁烟促进委员会，它由有关的官署、协和会和民间绅士组成，伪中央委员会由总务厅长官任委员长，各级委员会都设置常会，下设矫治、管理、教化、取缔四科。从事有关禁烟的调查研究、审议立案，供行政机构咨询或提出建议。

虽然实施“鸦片麻药断禁方策要纲”，但1943年之后，日本由于战争的需要，在东京召开了鸦片会议，要求伪满洲国和伪蒙疆政府增加鸦片生产，从此伪满洲国罂粟的种植又有扩大，不仅热河省已减少的又恢复了，而且在奉天、吉林、四平三省又逐年扩大了罂粟的种植面积。

	奉天	吉林	四平
1942	500	500	300
1943	700	700	500
1944	1 000	1 000	700
1945	1 500	1 500	1 000

日本帝国主义根据其侵略战争的需要，扩大罂粟的种植面积，目的是使伪满洲国成为供应鸦片的生产基地之一。

伪满时期的“鸦片断禁”政策

王贵勤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后，竟然步老牌帝国主义之后尘，继续用鸦片剥削毒化中国人民。他们是打着“鸦片断禁”的招牌，在冠冕堂皇的伪装下进行的。

一、“鸦片断禁”政策的出笼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后，就把鸦片政策作为它殖民政策的组成部分。1932年9月伪满设立了鸦片专卖委员会，各地区设鸦片零卖所，同时公布“暂行鸦片收买法”。作为这个法的具体实施，伪满政府迅速地以低廉价格收买了大量鸦片。同年11月公布《鸦片法》，主要内容是：一般人不得吸食鸦片，但对已中鸦片瘾的，为了治疗许其吸食。考虑宣传辞令，还附加诸如严禁种植、制造、买卖鸦片和烟具等条例。与此同时，在长春成立由伪财政部直辖的鸦片专卖公署，在全满实行鸦片专卖，这实质是鸦片“官卖”，更确切地说是鸦片的垄断政策。专卖公署设大东号、大满号两个烟土庄和在各地的分署32处：①负责聚集和分配鸦片的专卖业务。如大满号专搜集本部地区生产的鸦片，大东号则主要在东部地区收纳。除此之外，专卖公署每年还从朝鲜、伊朗、印度等地输入鸦片几百万两。鸦片由伪财政部指定的各省批发处领回，再分派于各省长指定的鸦片零卖人经营的零卖所。据某汉奸供认，满洲国第一批指定零卖人约一千三四百人，吉林省362人，以后又陆续增加。据日本当局大大缩小的数字，1937年全满零卖所约2000所。②零卖所都是南北大炕，有的简单地隔离成小单间，每单间设两人吸烟席位，有所谓管灯的人专管烟具。这样鸦片零卖所即张灯供客开始营业，鸦片烟在东北也变私卖为公卖。

鸦片的专卖造成了烟毒的泛滥，使地利民生双受祸害。这种行径招致中国人民的非难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为掩人耳目，1937年10月21日，日伪拟定了有名无实的《鸦片断禁方策要纲》。

二、是断禁还是开禁

《鸦片断禁方策要纲》条目繁多，其主要内容是，伪满洲国从1938年开始到1947年的10年内，使所有鸦片瘾者完全戒除。作为实际措施是罂粟的栽种面积从1938年开始每年递减，到第8年就不再栽种。要纲看起来冠冕堂皇轰轰烈烈，实际是挂羊头卖狗肉，政策本身是何等讽刺。

第一，十年断禁方针

根本没有提出对吸毒者的治愈计划，实际作法是提供方便保证需求。如《要纲》只规定不登记就不售与鸦片的原则，表面上对吸毒者进行了限制，实际上不管是谁，只要申请登记，不经检查便可领到伪满政府发给的鸦片吸食许可证。1939年，原专卖公署掌握的鸦片事务完全移归由伪民生部直辖的禁烟总局，取消各地的零卖所，设立一元化的官办“管烟所”。据日伪当局内部统计，1940年全满管烟所已达1686所。管烟所是以戒烟为名，行卖烟纵毒之实。各管烟所私卖烟份，无吸烟证的人也可随便出入。为提供方便，管烟所的烟盘上就系着吸烟证，只要登记入管烟所大门即可保证吸烟。特别是各管烟所都招用烟妓，引诱了无数素无鸦片嗜好的青年走入下流。据当年奉天做过管烟所女招待的某人揭露，当时奉天市和平区私烟馆不算，规模庞大的官办管烟所就有“群英楼”、“萃英楼”、“会贤楼”、“裕兴楼”四处。最小的“会贤楼”烟馆就设单人房间19间、便铺7个、女招待13名，每天接待烟客300人之多，其中50%是青壮年。因有烟花女子的殷勤招待，管烟所买卖之兴隆使当时妓院营业也大为减色。

第二，扩大罂粟栽培地域和栽种面积

十年断禁方针明确规定，自1938年开始，罂粟栽种面积逐

年减少，到第八年就不再栽种。但实际上日伪则恰恰相反。他们提出了“为了禁烟，必须种烟”的荒谬口号，把原罂粟栽培地域化散为整，指定热河与兴安西省一部分地区为合法栽种区域，但实际栽种地区远不止这两省。据日伪内部统计，1938年，即鸦片断禁的第一年，伪政府指定热河的栽种面积是36万亩，全满59万亩，1940年以后，由于战争需要鸦片量剧增，中东地区的鸦片输入又中断，日伪便公开扩大罂粟栽种面积。1942年伪满政府不仅把1938年名义上递减的面积完全恢复，还把种植地域扩大到东北各省内许多地区。特别是1943年春，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鸦片会议，决定满洲国和内蒙成为亚洲鸦片生产基地以后，日伪更加大规模地扩大鸦片生产。据日伪内部统计，1943年全满鸦片种植面积是68万亩，1944年已达73万亩。1944年以后，为加强管理，日伪还推行集团栽种的办法，美其名曰“鸦片生产组合”，每个组合约3000亩。这实际是强迫老百姓栽种和出售鸦片。如1944年奉天东杨官屯被组合强租200亩地，收割时以“勤劳奉仕”名义强迫全屯60户人家的妇女、学生割烟，违者严惩。由于大量优质土地被用于种植鸦片，致使粮食减产，加之奸商趁机抬高粮价导致恶性循环，油煤布匹莫不奇贵，人民叫苦不迭。

在强行扩大罂粟栽种面积的同时，日伪还加强了鸦片高产研究及储藏精制。

1943年，伪禁烟总局在长春市郊大屯划特定地域作鸦片试验场，专门进行罂粟优良品种培育和高产研究。日伪还在长春建造专门储蓄鸦片的大仓库，并在奉天、铁岭、绥化等地建鸦片烟膏制造厂。其中以奉天的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该厂设于奉天大东边门外，全厂有职工300多名，其中行政职员50多人，技术人员（技佐、技士）40多人，工人200多名，昼夜三

班，不仅制造鸦片烟膏，还制造吗啡。禁烟总局还在奉天设立鸦片和麻药研究室，在戒备森严绝对保密的情况下，研究毒害人民的最佳效果。日伪就这样一面高喊禁烟，一面又扩大种植，加紧生产鸦片。

第三，鸦片瘾者数量急剧增加

吸毒人数增减如何，这是鸦片断禁与否最可靠依据。然而使伪满政府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的是，推行断禁政策的结果，吸毒人数不仅未见减少，反而直线上升。据伪满禁烟总局统计，1933年鸦片瘾者是10万人，1935年20万人，1936年50万人，1937年80万人，到1939年差1人不到100万人，外加吗啡瘾者44万人。另据1944年伪禁烟总局调查结果，全满除正式登记者外，还有约120万潜伏瘾者（即未成年和轻微瘾者）。那么根据以上数字推定，除去伪满前吸毒人数，傀儡政权建立后中毒人数至少可达200万人。吸毒人数增长如此惊人，这就是日伪“断禁政策”的显著成绩。可见日伪在东北绝非鸦片断禁，而是开禁。

日本殖民当局的鸦片政策

袁庆清

伪满政权建立之初，尚不敢明目张胆地大规模种植和大规模制造鸦片。其后，1935年古海忠之充任伪总务厅的主计处长，为搜刮东北人民的膏血以供关东军及伪满政权的军费和开支，极力主张应向鸦片专卖上着想，以解决伪满的财政问题。其后，得到关东军的支持，所以就由他主持筹划。但解决财政仍是一

个表面问题，而实则是“一石杀二鸟”的阴谋，即搜刮了民财又削弱了我国人民的体力和志气，以便永世霸占我国的土地和奴役我国的人民。1940年根据古海忠之的筹划在伪满成立全国性的禁烟总局。总预算收入每年为2亿元。在各省市设有禁烟科，在各县警察科内设有禁烟股。名为禁烟而实则是大卖其烟，并且是越多越好。在热河种烟面积规定为5万垧，每年抽烟税50万两，共可得烟250万两。又向朝鲜、伊朗两处每年各购入100万两，以行销于我国东北各地。又在各地，例如奉天、绥化等地设立大规模的制造烟膏工厂，专制鸦片和麻醉剂，如吗啡、海洛因等。此外又制造大批烟料作为配制烟膏时使用，并设有鸦片批发人。全国瘾者登记第一次是60万人，后来又增加到100多万人。瘾者可以把烟份拿到家中吸食。名义上逐渐断禁，但实则绝无禁绝之想，而是变本加厉，毒化更深。烟份初期几毛钱一份，后又高抬价格，而由于卖烟的大利所在，所以烟料的比例就越加多，而烟质就越行恶劣，以至吸者中毒越深。在热河产烟地区向烟民逼索烟膏，甚至掘地拆房穷极搜索。而种烟面积也大事扩充，初仅偏僻之地，后则肆无忌惮，甚至通都大邑左近也有鸦片种植。如在1944年我乘东长路火车就在铁岭铁道两旁看见有许多开小白花的鸦片烟地，甚至在长春净月潭附近也有鸦片种植。每年春季容易生病时节，瘾者即纷纷倒毙。例如在1945年春季在哈尔滨市道外桃花巷，即倒毙了不少的鸦片瘾者。鸦衣鸠面骨瘦如柴，使人不忍目睹。很多烟瘾者由于吸食鸦片而破产，甚至竟有卖儿卖女，将自己的妻子押入娼窟，以求一时快活，或窃盗拐骗，丧失了人格，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所施行的鸦片毒化政策的严重后果。而古海忠之在1942年又亲身携大宗烟土到上海、南京与日军司令部和伪满驻南京大使馆接头，在上海出卖大宗烟土。

禁烟政策的欺骗性

王贤沛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帝国主义认为鸦片烟的流毒，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因此，伪满洲国政府公布实施了“鸦片专卖法”、“麻药法”。日本帝国主义把这两个法令美其名为“禁烟政策”。但这并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好心肠，为了伪满洲国人民的保健关系，而是以禁烟为名，把鸦片烟的买卖权，拿到伪满洲国政府的手里，以扩大伪满洲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这是一个不小数字的收入。

伪满洲国政府在鸦片专卖法的垄断掩盖下，在伪满各地开设了约有2000余个“鸦片零卖所”，由鸦片专卖机关供给零卖所烟膏，以备瘾者吸食。这些经营零卖所的商人，目的是为了发财，所以把零卖所收拾得很干净，雇佣女招待，接待烟客吸烟。就因为零卖所里有了女招待，吸引着人们往零卖所跑，就是不会吸烟的人，为了女招待，也往零卖所跑，零卖所的生意兴隆起来，而吸鸦片烟的瘾者也增加起来，经营零卖所的人也发了财。所以在伪满当时，想要取得一个鸦片零卖所的许可权，是相当难办。

在鸦片零卖所以外，还有“花烟馆”、“私烟馆”，这样的烟馆，也是有许可的，否则领不来烟膏。不过范围小，只有两三间住房，有一个或至多两个女招待，接待客人吸烟，并兼营副业，如娼妓一样。这样小范围的烟馆，在伪满各地都有，如伪安东县的所谓“城隍庙后”、“某巷”等，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

住户人家，既没有牌匾，也没有特别的标志。

到了1937年以后，伪满洲国政府为了加强专卖，增加财政收入起见，又大喊禁烟。在这一阶段的“禁烟政策”，就是伪满所谓的“鸦片断禁十年计划”。

伪满洲国为了实行这一计划，特在伪国务院总务厅组织一个“鸦片断禁委员会”，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谷次亨为干事长，由伪国务院总务厅企划处负责制定鸦片断禁十年计划的方案。我是鸦片断禁委员会的干事，经常开会讨论制定具体方案的条文措施等。在讨论中，日满双方委员、干事们，发生了分歧意见，总的说来，双方的意见是这样的：

所谓满系人的意见是：既能决定要断禁鸦片，在年限上说，不需要十年，有三五年即可。首先要杜绝鸦片烟的来源，禁止种植鸦片加强取缔秘密输入。其次是取消鸦片零卖所，对吸鸦片的瘾者进行登记，凡是登记的瘾者，由政府供给一定数量的鸦片烟，并且逐年减量，促其戒除。新瘾者不致再产生，旧瘾者逐渐减少，很快地就可以达到禁烟的目的。

所谓日系人的意见是：鸦片断禁，不能操之过急，尤其不能强制，十年禁烟的期限并不算长。鸦片零卖所的弊病很大，可以改为国营。凡是登记的鸦片烟瘾者，一律不准在家吸烟，必须到卖烟机关去吸，这样可以杜绝瘾者把烟领回去，作私交易。没有登记证的人，不准吸烟，新瘾者不至再产生，旧瘾者在十年以内，陆续到戒烟机关去戒烟，无论如何期限不能少于十年。

伪总务长官星野直树是鸦片断禁委员会委员长，他同意日系人的意见，他认为对瘾者来说，十年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期限，是一个既不急又不缓的措施。在这个期限内要加强戒烟机关的措施，要加强取缔鸦片烟的秘密输入和秘密种植的措施。

结果，伪满洲国鸦片断禁十年计划的方案制定出来，把许

可私人经营的鸦片零卖所改为公营的管烟所。指令伪警察机关加强对鸦片烟的秘密种植、秘密输入、秘密制造的取缔。在伪专卖机关里增添了许多“专务取缔员”。实行吸烟瘾者登记和鸦片烟贩卖通账制。在伪满各地设立“康生院”收容瘾者戒烟。

从这个方案实施的外表形式上看，像似在进行鸦片断禁，而实行内容，则是以迷惑人的假象，加强掌握鸦片的贩卖权。

看看所谓戒烟机关康生院，内容设备简陋，对于戒烟的瘾者待遇粗暴，瘾者害怕去戒烟，等于虚设。以后用强迫手段，非去戒不可，瘾者都不愿意去。到了后一阶段，伪满劳工不足，就把强迫或自愿去康生院戒烟的人，送到厂矿去做“劳工”，康生院变成劳工院，瘾者的烟瘾没有戒掉，生命送掉了。所以有了康生院是“坑生院”的说法。

在1937年以前，伪满洲国没有实行鸦片断禁十年计划时，对于鸦片烟瘾者，没有实行登记，也没有统计数，仅据专卖机关按销售出去的鸦片烟数量估计，约可有一百四五十万瘾者。在1937年以后，实行了鸦片断禁十年计划，实行瘾者登记，全伪满约有60余万鸦片烟瘾者。

为什么伪满洲国实行鸦片专卖后，仅仅几年时间，全伪满的鸦片烟瘾者，就由一百四五十万人，减到60余万人呢？这并不是说伪满洲国实行鸦片专卖，所谓的禁烟，收到了效果，而是因为瘾者怕登记，怕登记后，强迫去康生院戒烟，怕登记后丢面子。所以有“身份”的人都不登记，不登记不能去管烟所吸烟，这些有“身份”的人，宁肯花高价买私烟吸也要瞒吸烟，因此登记瘾者数就少了。

据当时人们估计，鸦片烟瘾者，至少是从一百四五十万人增至200余万人。因为从伪满成立后，实行鸦片专卖，所卖出的烟膏数量，60余万瘾者，不可能吸这样多的烟膏。日本殖民当

局心里也明白，但在表面上看，登记瘾者数减少了，这就是禁烟的成绩。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所要实行的禁烟，是挂羊头卖狗肉，主要是为了财政收入，不过是以禁烟为烟幕，掩盖舆论的一种手法，吸烟的人越多，它越高兴，这就是它的毒化阴谋。

在我视察奉天东关外的鸦片烟膏制造厂时，日本经营人很自豪地说了制造出的烟膏，大有供不应求的情况，以及在烟膏里掺多少料子的情况，和制造海洛因、吗啡的情况。

在1938年，为了伪满官吏禁烟的问题，伪国务院总务长官星野直树，命令伪国务院总务厅监察官、参事官，组成五人的监察班，到伪中央各官厅去，进行对伪满官吏的鸦片烟瘾者调查。调查的方法，是从简任官以下的伪官吏，挨个进行谈话。如果在某人的面容上或其他方面，认为有烟瘾嫌疑时，报告给伪总务长官，再由伪国务院总务厅人事处通知所属机关，限期戒烟。如果不戒烟，查出撤职。因为日本殖民当局的本意，不是真的禁烟，所以这个作法也是假的，走走形式，有鸦片瘾的伪官吏，由公开吸转入秘密吸，就算达到了目的。伪总务长官星野直树曾嘲笑地说：“满系大官们，饭可以不吃，鸦片烟不能不吸。”

到了1940年，伪满洲名义上是为了强化禁烟，在伪政府中央，添设了“禁烟总局”，在伪政府地方组织机构里，也添设了禁烟机构、禁烟科。其内容是加强专卖制度，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看看伪满种植鸦片的情况，就可以明白了。

伪满洲国内的种植鸦片区，主要是在伪热河省地区和北满下江一带。随着鸦片断禁政策的加强，鸦片烟种植区，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到了1943年以后，全伪满各地普遍奖励种鸦片烟，不仅供给瘾者吸用，还供日本军用，也有时输出鸦片烟，也有时由国外输入鸦片烟。

既然伪满洲国大喊禁烟，为什么扩大鸦片种植面积，作输出入的买卖呢？主要是为了“战时资金”的需要，以禁烟为名，掩盖见不得人的贩毒，获得财政收入。所以说，伪满洲国所实行的禁烟政策，是一个欺骗性的政策。

伪热河省的鸦片走私

滕利贵

地处塞北的热河省，由于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适宜，历史上就有栽培罂粟的习惯。尤其是军阀汤玉麟把持热河期间，极力提倡鸦片种植，大肆进行毒品走私，从中牟取暴利。仅仅几年时间，汤玉麟父子就成了独霸一方的中国巨富。从而使热河省成为亚洲的重要鸦片产地，被“誉为”鸦片王国。

1933年3月，日本关东军侵占热河后，立即宣布热河为伪满洲国的鸦片产地，每年由日伪当局规定鸦片种植、收购数量，强制当地农民实行。同时，关东军插手毒品走私，将鸦片运销各地，以便获取暴利，每年都有数千万元资金流入日本国库。鸦片走私，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一项重要财源。1944年6月，伪满保安局奉关东军之命，对热河省的鸦片走私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现将其调查情况整理如下：

一、热河鸦片的基本状况

1. 伪政府机关的收买

1943年度，伪满政府指定热河鸦片种植面积30万亩、18万户，相当于总耕地面积的2%。一般收获量每亩平均25两，共计

750万两，如果再加上私种之数，总数将超过1 000万两。伪政府对种植鸦片采取奖励办法，主要是：政府只收购鸦片产量的一半，其余归栽培者自行处理，可以用高价卖给毒品走私贩子；对于完成鸦片供出量的农民，由政府特别配给一些棉布等日用必需品。1943年，伪禁烟总局在热河省共收购鸦片4 713 171两，全伪满的收购数额为5 381 227两。这一年伪政府鸦片收购价格是：每两特等10元；一等8元；二等5元；等外0.5元；平均每两7.7元。这种奖励政策虽然使伪政府每年都完成了收购任务，但是留在民间的鸦片越积越多，这就为鸦片走私创造了条件。伪满官方的收购机构，1934年至1937年是大满号；1938年至1939年则由农事合作社负责；1940年是兴农合作社；1941年以后则成立了鸦片生产组合。这种体制的变迁也为鸦片走私提供了机会。

2. 为栽种、收购鸦片动用的资金

伪满政府及民间为栽种、收购鸦片而动用的资金达15亿元，其中民间鸦片投资者多为河北的土豪劣绅，他们占有全部种面积的80%，所以，伪政府每年向烟农的贷款大部分都落入这些人手中。1942年度，伪热河省兴农合作社鸦片耕种贷款350万元中约200万元归这些人所有。

3. 鸦片走私状况

(1) 走私数量

据禁烟总局估计，1943年热河省鸦片收获量1 000万两，政府收购470万两，剩余的530万两，其中当地农民消费100万两，走私到省内外200万两，其余230万两政府以特配为诱饵追加收买，或流出省外。但是，根据保安局的调查，热河省鸦片最高生产量约1 400万两，政府收购500万两，剩余的900万两除省内消费300万两（每百人中有5人吸烟，全省约有鸦片瘾者

30万人),其余600万两全部走私到外地。向省外走私鸦片的价格很高,仅通过省境时每两平均60元,总数可达到3.6亿元。

(2) 走私方法、路线

鸦片走私是采用各种方法进行的,如:将避孕套截成两段各装三四两,吞入腹中,途中因套破而丧命者大有人在,仅1943年就死亡十四五名。其他还有的把鸦片装入猪羊内脏,更有甚者则挖出婴儿的内脏在其腹内私藏鸦片等。总之,采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无奇不有。

鸦片走私的路线,首先是铁路。毒品走私贩子与铁路职员相勾结,尤其是日系职员的援助,运用铁路大量私运鸦片。大多数都是从承德、平泉、叶柏寿、朝阳等车站,运往锦州、奉天等地。协助铁路走私鸦片的人员,每两可抽取4元至6元,最高达到每两抽15元。其次是用卡车、大车、骡马、步行,实行陆路运输,其具体线路是:

— 经八里罕(喀喇沁中旗)到三江子,然后进入河北。

— 经隆化县经兴隆县而进入华北。

— 经围场县经丰宁、虎什哈,到河北省石匣镇。

— 经赤峰经开鲁,到通辽,或经礼泉、林东到兴安、蒙疆。

除上述铁路、陆路走私线路外,还有的由铁路运到锦州、营口,然后再乘船南下,往朝鲜、山东者甚多。更有甚者自承德乘飞机从空路私运。

(3) 走私时期及抓捕情况

鸦片走私时期一年四季皆有,但以秋后收获期最多。因此,抓捕率以十一二月为最高。一般毒品走私者,以无业的赌徒为多,他们熟悉生产者,与缉私人员狼狈为奸,所以抓捕率极低。如发现者为1人时,则将鸦片拿出一半送与揭发者;如发现者人多时则要全部拿出,请求免去走私之罪。缉私人员发现走私者

多半不报告，而将鸦片私吞，所以抓捕数额很少。1943年，伪热河省抓捕鸦片走私者649名，没收鸦片十二三万两。

4. 各地黑市价格

鸦片价格的确定很困难，主要是：鸦片因掺入料子的多少而质量不同，烟土每经手1人必加入料子。料子是加在烟土里的面粉、苹果、土、玻璃、豆腐、猪皮、百合花等的粉末，料子每两价格最高3.50元，最低0.50元。热河省喀喇沁中旗八里罕村是鸦片料子的主要产地，观察其活动便可窥知热河鸦片走私的动向。

鸦片的黑市价格，每两：在农民家中收购最低30元，铁路沿线较高，出省境时六七十元。根据1944年4月调查，北京每两150元，哈尔滨每两180元，新京每两150元，奉天每两150元。与1943年相比，价格上涨了60%。

5. 华北报贴鸦片政策

伪华北禁烟总局所谓报贴鸦片政策，就是奖励热河鸦片走私。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地区沦陷。随即由驻华北日军和兴亚院设立了华北禁烟总局，以便操纵毒品走私，为日军侵华提供财源。伪华北禁烟总局在北京、天津、唐山及长城沿线设立十几处分局，为鸦片走私发放通行证，奖励热河鸦片向华北走私。日本驻华北军政当局之所以实行这种鼓励政策，其一是抽取鸦片通行关税，利用华北与伪满换算上的差别获得暴利。当时的重量单位，热河1两是50克，华北1两是31.5克，也就是热河的1两等于华北的1.6两。1943年度从热河吸收鸦片200万两。其二是极力扩大鸦片在华北乃至中国各地的泛滥，以此毒害中国人民的斗志，摧毁抵抗意志，达到灭亡中国之目的。

二、热河贩毒网

热河作为鸦片的主要产地,受到日伪当局的保护和支持,为伪满政府提供必需的鸦片;同时也是走私贩毒的基地,在这个王国里滋生了一批毒品贩子。他们内外勾结、上下串通,形成了一个严密的贩毒网,在关东军和伪政府的纵容下,大肆进行毒品交易,运用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欺压百姓,充当日本帝国主义掠夺资金,毒害中国人民的鹰犬。

1941年7月,关东军派遣汉奸张墨林带巨款去热河收购烟农私存鸦片,然后走私到华北、华东、华南等地,换取战争急需的物资。张墨林到热河后公开宣称自己是通天人物,运用各种强硬手段购买鸦片,扰乱了伪政府的正常收购,遭到伪热河省的强烈反对,关东军不得不召回张墨林,另派伪经济部嘱托安藤道夫前去收拾局面。安藤道夫秘密来到热河深居简出,主要搜罗当地毒品贩子为其效劳。这些贩毒者自恃有关东军、伪满政府为靠山,以低价强行收买烟农剩余鸦片。一部分鸦片交给安藤道夫,另一部分归自己所有。不久,伪满政府为全面控制热河鸦片走私,在承德设立了裕东公司,专门从事贩卖毒品。一些贩毒者均被网罗在该公司,充当公司的工作班长,具体负责收买鸦片事务。在安藤道夫和裕东公司支持纵容下,热河省毒品贩子势力急剧扩大,形成了以八里罕村为中心的贩毒网。

伪热河省贩毒网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即喀喇沁中旗八里罕村、瓦房街和赤峰县城。

喀喇沁中旗位于热河省西北部,与内蒙的坝上地区相连。此旗内多山,地形复杂,土地贫瘠,人烟稀少,适于各种非法活动者寄居,是热河省毒品贩子的主要巢穴。该旗八里罕村是鸦片料子的主要产地,一些主要贩毒者都居于此地,形成了以孔

援刚为中心的贩毒网。

孔援刚是该地的大土豪，家产上百万，土地近百垧，并在天津、唐山开设多处店铺。万贯家财大部分来源于毒品走私。孔援刚以制造鸦片料子起家，逐渐垄断了料子生产，同时开始大规模鸦片走私。孔援刚曾为安藤道夫收购鸦片，担任裕东公司工作班长。1941年，在他的管区内，强迫种烟者每亩供出10两烟土，凡是不肯交出者，每亩鸦片抽60元。这一年在他的管区内共收购了2万两鸦片，其中一些交给了安藤道夫，大部分则归己所有，加入自制的料子后向外地贩运。孔援刚在八里罕建有堂皇的住宅，围以坚固的高墙。院内有地窖多处，经常藏有鸦片数万两，每年走私的毒品约数万两。其走私的方法是买通铁路车站职工，以小件行李向各处发送，有时甚至列车警察亲自护送，确保万无一失。另外，经常以高工资雇用居民四五十人为其偷运烟土，每人每次携带烟土四五两，在武装马队的护卫下，强行突破长城线上的白羊峪进入建昌营。在此将货物归在一起，由滦河用船运到唐山，再转卖到北京、天津等地的烟膏店。孔援刚在唐山置妾，天津、滦县有其联络所，在天津法租界有其经营杂货店作伪装的鸦片销售店。

孔援刚自知目标明显，深恐发生变故而其财产丧失。因此，在其家中隐藏若干枪械以保护毒品及走私的安全。用重金买通各级官吏、警察，作为其保护者。同时将其财产向华北转移，以防不测。由于其势力日益巩固强大，日伪当局虽然想将其除掉亦非易事。

该贩毒网中其他毒品贩子还有蒋介石、范老三、孙雅荣等。

蒋介石是仅次于孔援刚的大宗毒品走私犯，每年私贩毒品约上万两。他手中存现货，随收随卖，所以不被当局注视。走私的大都向奉天、哈尔滨等伪满内地，与铁路、警宪均有相当

疏通。

范老三和孔宅、蒋宅相连，三人经常合伙走私，是鸦片料子的主要制造者，每年走私烟土约2万两。

孙雅荣是毒品贩子中的奸滑者，曾担任裕东公司工作班长。1941年，在为安藤道夫收购鸦片时，以种种理由没收烟农的鸦片，将其中一部分掺入大量粗制料子交给安藤道夫，发现后被抓，不久便释放。孙雅荣交际范围极广，其走私路线上的日伪警宪、铁路职员、行政官吏均被收买，凡为其毒品走私有助者给予重金酬谢。

喀喇沁中旗的瓦房街，是毒品贩子的另一聚集地。该地是一个只有200户人家、七八家杂货铺子的小街，之所以成为贩毒者巢穴，主要是：（1）该街处于三县旗交界处，自清末以来行政管辖多次变更，各级政权对其不甚过问，行政警察的责任淡薄，各种法规、管理无人过问。（2）该街周围皆山地，且店铺过多，交通不便。伪满实行统制经济后物资匮乏，故商人多从事于鸦片走私。（3）该街周围是鸦片的主要产地，烟农多半随意种植罂粟，不受伪政府的指定限制，所以此地剩余烟土多于其他各地。由于上述一些原因，毒品贩子很多盘据于此，成为热河有名的贩毒魔窟，前来贩毒者常年络绎不绝。

瓦房街成为毒品贩子盘据地，更重要因素就是得到警方的保护。喀喇沁中旗警务科长王警正家居瓦家街，其子弟、家族皆从事贩卖鸦片。这些毒品贩子在王警正指挥下，并得到旗内警务机构的保护，公开进行贩卖毒品。更有甚者，1941年度，王某之长子等用大卡车满载烟土，插上宪兵队的标志，堂皇运送到奉天。瓦房街附近的天义火车站，上自警卫队长，下至一般职员，皆被王警正所掌握，甘愿为其效命。只要是王某走私团伙者，所带各种物品均不检查，并同车内同行联络设法保护，有

的利用歇班亲自送到指定地点。而对于非王某团伙，虽持有一个烟泡者也要抓捕。可以说，喀喇沁中旗所有日伪警宪人员，无一不受鸦片走私之惠。

赤峰是热河通往东北的必经之地，也是鸦片走私的集散地和中转站，产地的毒品贩子和销售地贩毒者，多数在这里成交。因此，在这里出现了一批专门充当中间人的贩毒集团。其首领为郝文彬。郝氏曾充当伪满宪兵队的密探，其联系极广，他不但买通赤峰副县长、副站长，而且赤峰沿线的所有日系警护人员都被他贿赂，郝文彬每年单独走私毒品3万两，主要运往锦州、奉天，在两处均有商号、联络所和私卖所，并娶妾多名，作为鸦片隐藏地。

三、毒品的取缔

伪满政府为实行鸦片的专卖，对走私者严厉取缔，不但设立专门的缉私队，而且各类警宪人员均负责取缔，对于有功者给予奖励。但是，很多取缔人员均为走私者收买，成为毒品贩子的合谋者。1943年3月，喀喇沁中旗大毒品贩子马俊卿，多次拜访黄土梁子警察分所长吴鸿禧，向其行贿重金，将自己毒品走私路线告诉吴所长，请吴给予保护，二人订立密约。1944年4月初，马俊卿送予吴鸦片500两，说好明日走私团伙将经过此地。第二天，该旗特务股长李某接到马俊卿武装走私团通过黄土梁子，遂率领部下急赴该地，果然发现该团在行进中，走私团一行25名，并有武装卫士数名，李某遂向黄土梁子分所求援，吴先是不肯支援，随后便派两名警察前去协助。午后3时，特务股长李某趁走私团伙吃饭之机部署围剿。此时黄土梁子两名警察抢先开枪报警，使走私团伙立刻应战，将李股长击伤而使追捕无法进行。

此外，缉私队、各县旗鸦片组合人员，无一不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因此，热河省鸦片走私成为公开的事情。

伪满的毒品政策

牟建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向东北各个角落，除军事侵略外，还推行毒品政策，残害中国人民。1933年竟引诱东北农民种植罂粟。由伪政府运来大批罂粟种子，要农户种植，并规定每亩烟田秋后向伪政府缴纳鸦片烟（俗名叫烟土）10两（旧秤16两1斤）。许多人受到引诱，认为有利可图，即高价租赁土地种植罂粟。

种植罂粟，要有技术。第一，要会识别烟桃是否成熟，何时该割。第二，割烟时持刀用力轻重，要有分寸，用力过猛，将烟桃割透，烟浆漏进桃里，这个烟桃割一次就报废；割的轻重适当，烟浆涌出，这个烟桃两三天就可割一次，一直到秋。第三，割的烟浆，集中起来，晒轻了不成，晒重了烟就少了。这些技术问题，烟民都是边摸索边干，也有的随意乱干，秋后结算，损失严重，以至无力缴纳官烟土。有的为了凑数，在烟土内掺加杂质（俗名叫烟料子，用苹果或面筋制造），但是县方收缴鸦片部门，有专人验收，经过检查，发现杂质，轻者扣秤罚款，重者没收。有的烟民交不齐烟土，只有外逃。农民种植罂粟，造成粮谷减产，粮食紧缺，导致农村经济混乱。1933年10月至1934年4月，我在九连城警察分局马市台分所当警士，多次外出督催收鸦片，多是见不到本人。1933年冬，安东市镇安

路有个住户叫王北海，他在马市台租地种植鸦片，欠官家烟土10两，我去催过两次，均未见到本人，只由家中妇女出面应付支搪。诸如此类者，为数不少。直到1934年春耕时，收缴鸦片工作尚未结束，最终只得用“本人潜逃”或“行方不明”及“死亡”等词而上报了事。

县方收缴大宗鸦片烟，除上缴一部分外，另一部分则公开贩卖。贩卖方法：在各处开设鸦片零卖所（也叫官烟所），当时安东市官烟所不下百家，如财神庙街、前后聚宝街、兴隆街、中富街、县前街等都有一至两家官烟所。兴隆街东首路北，原有亚东旅馆，其侧门横匾则大书“居仁堂”，实者后院则与旅馆混为一体，一室两用，即为旅客房间，又是烟客房间，生意兴隆，终日烟客盈门。至于其他僻街小巷，更是遍布烟馆。而在农村如九连城、汤山城、大东沟、河深沟等处，均设官烟所。吸毒者可到警察署登记，领取吸食证，到官烟所吸食鸦片。

另一部分鸦片，通过各种渠道，高价售给市内秘密开的私烟馆。据警察厅卫生科1935年不完全统计，安东市秘密私烟馆（或花烟馆）有1800多家（不包括日本租界内的）。官烟所还雇佣女招待，侍候烟客，招徕生意，使吸毒者日益增多，特别是青少年，受到引诱，而变成新瘾者。据瘾者自述：正常人若每天吸一二次，一个月间即能成瘾，成瘾者如一天不吸或吸量不足，即涕泪交流，周身不舒。我的同事徐风林年28岁时，因吸食鸦片成瘾，1937年被解职，遂流落于安东市，吸食吗啡，最后将妻子出卖于妓院，而本人亦惨死于途。还有一个叫郝玉璋的，字一男，系汤山城人。他的父亲郝永江，在安东县警察大队当中队长，1933年夏在大孤顶子被抗日军击毙。县方为了笼络人心，当即委任年方19岁的郝玉璋接替父职，郝玉璋一步登天后，一切活动都有勤务兵侍候，又得到抚恤金数百元，而养

成花天酒地吸毒成瘾，1935年被撤职后，将妻子和妹妹都抵押于妓院，而本人也在乞讨中死亡。这样的事例很多，举不胜举。

1938年，官方将供应吸食毒品政策变为“解除毒瘾”政策。成立了一个变相贩卖毒品的机构叫“康生院”。安东县的康生院设在石门村浑水泡，表面上是让吸毒者轮班到康生院去解除毒瘾，而实际仍是供应吸毒，无一人解除毒瘾。康生院与官烟所不同之处，就是把一部分吸毒者集中到康生院，集体管理起来，不准随意外出和回家。由于长时间推行贩毒政策，康生院管理人员又弄私舞弊，秘密高价盗卖毒品，以致造成瘾者终日呻吟和谩骂管理人员，而遭到殴打，因而一些在院内解毒者，把康生院的名称颠倒过来，呼之曰“生抗院”以解胸中愤懑之气。嗣后即发生逃跑和无人申请入院解毒，致康生院名存实亡，苟延二年，即无形废止。

吸毒者在毒深瘾重时，吸食鸦片，已不能解瘾，乃逐渐改吸“海洛因”（俗名叫白面，也叫吗啡）。海洛因力量大，作用快，因而私烟馆多改贩“海洛因”。安东“海洛因”的来源，一是大连，二是朝鲜。在那个年代，朝鲜人到中国来居住务农经商的，大都私贩“海洛因”。

1944年春，我在大东沟警察署时，有一天得到一情报：在一个星期天，有一个朝鲜人带着太太和小孩，乘坐轿车，从安东向东沟秘密运吗啡。到了星期天，我就派人在公路上堵截，在上午9点多钟，有一辆黑轿车，在火神庙街后边被堵住，车里两个朝鲜人，一男一女，男的着西服，女的着鲜式裙子，带着一四岁的小女孩，我们当即说明意图，进行检查，未发现毒品，正要带到署内，细加检询时，突然发现小孩怀中抱着一个化学制品的娃娃玩具，就在这玩具里发现了毒品海洛因两盎司（约合一市两许），据供系由朝鲜运来，当时价值伪币约500元。

在那个年代，大东沟官烟所经理于渭东、税务所长张润民、协和会长王文仕、大东沟街长李种德都吸毒。一些大商店的经理，玉顺棧的王玉堂、长顺永的郭鸿恩、长丰棧的王子臣、东和德的孔继昌、乾增德的孙俊章等，均是鸦片瘾者。而秘密开烟馆的有：高淑清、王俊峰、小银花（艺名）、王胖子（别名）、马淑清、张兰田，这些都是远近闻名的私烟馆。还有一些新开设而不知姓名的。另外有几家朝鲜人如金瀛男等都是以经商种地做掩护，私卖海洛因。

日本侵略者推行这个毒化政策的结果，中国人惨遭其害，家破人亡者甚多。进而蔓延到日本人身上，在安东县当指导官的日本人清水佑吉吸食鸦片成瘾。1934年在马市台水上派出所所有个日人警长名叫小岛伊胜，有严重鸦片瘾，犯了烟瘾，带着武器就躺在路旁，像死人一样。1935年被撤职，只身流落于马市台、九连城和安东之间，以借取、欺骗、威胁等手段，弄钱吸食鸦片。当他得知九连城住户徐程九的侄子（名不详）在国民党政府工作，他即向徐程九大加威胁，勒索金钱。徐程九出于无奈，每索必给，小岛得寸进尺，进而将行李搬到徐程九家，饮食起居吸鸦片都在徐家，闹得徐程九进退两难，才一月有余，除饮食外，只鸦片钱就化100余元。徐程九几次到警察署请求办法，那时警察署没有日本人，只得将情况转报到县，由县方同日本领事馆取得联系，将小岛弄至安东，后遣送回国。这仅是日本侵略者在殖民地推行毒品政策，弄得本民族亦惨遭毒害的一例。

（摘自《东沟文史资料》）

日伪对东北鸦片的统制

张延年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后，继承一切老牌帝国主义侵华手段，为掠夺殖民地人民财富，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实行“纵毒祸华”——鸦片政策。

一、鸦片的专卖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建立，它在关东军太上皇的控制下，于同年9月17日，公布“暂行鸦片收买法”，同时在伪财政部属下设立“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表面研究禁烟政策，实际是为鸦片的垄断专卖进行准备工作。在此基础上，同年11月3日公布“专卖公署”官制，成立“专卖公署”，主要掌握鸦片的专卖事务。又在同年11月30日公布“鸦片法”。可见日本殖民统治者对鸦片专卖迫不及待的重视程度，在短短的9个月就把鸦片的收买、专卖，完全纳入了伪政府的垄断之下，最后用“鸦片法”把它固定下来，从此伪政府就成为公开贩毒的机构了。

“鸦片法”共计二十二条，可概括为六个方面的内容：

- 1、禁止吸食鸦片，但对现有鸦片瘾者，由政府按最低量，配售供应。
- 2、由政府确定罂粟的种植地区和栽种土地面积。
- 3、生产的鸦片烟膏由政府收购、加工和销售。
- 4、对现有鸦片瘾者进行登记。

5、鸦片的生产、贮存、烟具的制造、销售等，均需经政府的许可。

6、政府成立戒除烟瘾的医院。

从以上的内容看来，这个“鸦片法”表面“冠冕堂皇”由禁烟开始到戒烟而止，但要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问题，得出另一个结论：鸦片由政府配售、生产、加工；对于瘾者登记，不需医生检查，任何人只要申请，均可享受“配售”的待遇。总之一句话鸦片由政府垄断。

关于伪满公开贩毒机构“专卖总署”建立之后，先后在地方设立的“鸦片专卖公署”有：奉天、新京、吉林、间岛、滨江、龙江、承德、营口、安东、锦州、四平街。各专卖公署设专卖工厂。还设有专卖分署：山城镇、长白、临江、赤峰、平泉等20所及专卖驻在所80处。例如1935年设立的奉天鸦片专卖署，地址在奉天（沈阳）市大南城门外大街西侧，机构有正、副署长，下设四科：总务科——主管人事、财务；生产科——主管鸦片生产工厂、生产生熟鸦片，配售给各市、县（旗）及城乡鸦片零卖所（烟馆）及征收营业税款；收购运输科——主管从热河地区各县及奉天东边道（包括通化）、四平、锦州等地收购鸦片，并输送给工厂；缉私科——设缉私官员30余人，随时派往各市、县（旗）等鸦片零卖所，进行稽查活动。它的专卖工厂的情况：奉天鸦片制造厂，设在奉天市小东边门外。有正、副厂长各一人，下设科室及车间，成员约百余人，另雇用女工约三四百人。分生产制造、成品包装、检查验收。生产生熟鸦片两种：生鸦片分福膏、禄膏、寿膏三种；熟鸦片，制造烟泡，每份重量为0.5克。成品由专卖署生产科发售。另外还用鸦片生产“白面”即吗啡，少部分做军用外，大部分售给日、鲜“浪人”走私或开吗啡馆用。

为了补充“鸦片法”之不足，1933年又公布“鸦片缉私法”和“查获私土奖励规则”，同时赋予专卖官员司法警察权。根据“鸦片缉私法”，在各鸦片专卖署内设缉私员460名，专门进行鸦片缉私活动，到了1942年又任命366名鸦片专务取缔员，配署在重点地方，协助地方进行缉私活动。到1943年缉私阵营又进一步扩大，全国警察系统、宪兵团、铁路警察及关税都参加了这项活动。

在伪满的鸦片走私活动，主要来自两个地区，一是来自朝鲜通过中朝边境的图们、通化、辑安等地，流向奉天、四平、长春、哈尔滨、北安、黑河、佳木斯一带；另一地区是热河的赤峰、围场、承德、平泉一带，流向锦州、沈阳、四平、白城子、齐齐哈尔、海拉尔等一带地方。查获的鸦片走私件数最高年份是1938年的33748件，查获鸦片的走私数量最高年份是1942年的313567两。平均每年查获的走私鸦片约在25万两左右，可见鸦片走私之猖獗，烟毒之泛滥的情况。

1937年日本又宣布“鸦片十年断禁”方针，要求从1938年开始，在以后的10年中禁绝鸦片的吸食。宣布的措施：加强禁烟的宣传教育活动，防止新鸦片瘾者发生，特别是25岁以下的青年瘾者；对现有鸦片瘾者重新进行登记；加强戒烟机构；加强鸦片生产、收购的管理；减少罂粟的栽种面积。还宣布伪公职人员、军人、学生绝对禁止吸食鸦片，否则开除公职、军籍、学籍等。

同时根据这个方针，禁烟机构也进行了调整，1939年末，把原来财政部领导的专卖总局的管烟机构，同民生部的保健司的烟政科合并，成立禁烟总局，归民生部领导。专卖总局仍进行盐、火柴、石油等项经营。同时把原来公营的管烟所和戒烟所——康生院，一律并入政府为地方机构。各省民生厅设保健科，

只有热河省及兴安总省民生厅设烟政科，市、县（旗）的行政科设禁烟股，只有新京、哈尔滨、奉天设烟政科。到了1945年元月，又废掉禁烟总局，由厚生部禁烟司掌握禁烟事务。但是不管禁烟机构怎样变动，罂粟照旧种植、鸦片工厂照旧生产供应瘾者。所以鸦片的专卖政策，就是官卖政策，禁烟是假，纵毒是真。

二、伪满的管烟所、瘾者与戒烟所

所谓“管烟所”就是伪政府公开经营的贩毒所，俗称烟馆，伪满初期经政府登记的就有2500多个。这些大烟馆又称“花烟馆”，伪满初期它是由各市、县（旗）、城乡内的、由私人出资开设经营的大烟馆，由鸦片专卖署发给经营许可证，在指定地区开设，从鸦片工厂，领来生熟鸦片，零售给瘾者，分“走份”或“吸份”。所谓“走份”就是允许瘾者在家吸食，“吸份”是在烟馆内就地吸食。称“花烟馆”，是因烟馆内雇用一些青年妇女，充当招待，开灯侍候烟客。有些人，特别是青年，本无吸烟嗜好，为寻欢取乐，久之便生瘾中毒，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娼妓馆。特别是在大城市和工矿地区，更为兴旺，如当时抚顺城，这种花烟馆就有五六十家之多。到1938年施行“十年断禁方针”，把管烟一律改为国营，1938年管烟所有1686个。1940年禁烟总局成立之后，又把管烟所改为官营，并入地方行政机构之中，每个市、县（旗）都有。1941年为1631所，1942年为1579所。这些管烟所就像殖民统治者伸出无数的触角，伸向瘾者的身边或家庭，吸盘似的，紧紧贴在上面吸着血、啃着肉。

关于鸦片瘾者数目，1906年全东北总人数为18415714人、瘾者为105686人，占人口总数的0.57%；1932年东北地区人口总数约为3000万，1933年伪满登记的鸦片瘾者为

56 804人；1934年为115 447人；1935年为217 60人；1936年为491 965人；1937年为811 005人。以上数字充分说明，由于伪满施行的鸦片官卖政策，进行纵毒，使鸦片瘾者，逐年增加，烟毒泛滥，所谓“禁烟政策”实际是“纵毒”，不就是很明白了吗？

关于戒烟问题，在“鸦片法”中就笼统地提出“瘾者矫治”问题，初期在新京、奉天、吉林、齐齐哈尔及承德成立5个戒烟所，1934年又增加5所，“十年断禁方针”确定后，要求各市、县（旗）都要设立一个戒烟所，并规定重点是戒除40岁以下的男性瘾者。到1940年禁烟总局成立后，各地戒烟所一律改为康生院。1941年全东北有189所康生院，收容瘾者12 370人。从东北烟毒泛滥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仅是政策的需要，缓和人民对鸦片的官卖政策不满罢了。

三、罌粟的种植、收购与加工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国境地带，日苏双方控制严密，往来隔绝，日本为确保国境地带安全，又不能不考虑到种植鸦片引起的社会混乱——匪贼抢劫、凶杀、卖淫、伤害世俗，远远超出鸦片收益带来的利益；同时种植鸦片造成居民吸毒、丧失劳动能力，影响经济压榨，妨碍殖民统治。所以从1934年开始对国境地带和另一些地方，对罌粟种植采取了限制政策。如1936年限制桦川、富锦、勃利、同江、抚远、宝清、饶河七县和伪牡丹江省的鹿林县等，允许种植罌粟土地面积为14 870垧，年产鸦片1965 031两，加上三江沿岸其它地方所产之鸦片，保持在300万两左右。在热河及兴安西省一带地方，由于地理条件适宜，每年保持种植罌粟面积5000~7000垧，年产鸦片烟量为1000万~1300万两上下，其中80%收归国有，余下流落在民

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补充军费，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需要大量鸦片，因此1943年在东京召开日本军事占领区的鸦片会议，伪满禁烟总局副局长梅本长四郎出席会议，最后承担了供应全亚洲日本占领区的鸦片生产任务。从此日本开始在奉天、吉林、四平等等省成立“种植组合”，进行“集团栽培”，在长春县的大屯，四平省的开原县等地方建立6个“集团栽培圃”生产鸦片，供应日本需用。

关于鸦片的收购，1934年由专卖总署指定收买人，如“大满号公司”在各地设七所分号，成立110处收集所收买鸦片。后来又由专卖署的工厂进行收购。1939年以后通过“农事合作社”或“鸦片组合”收购，集中到县（旗），交送到鸦片制造工厂，也有直接交送工厂的，如四平省的“集体栽培圃”就是这样。收购期伪政府规定每年从6月21日开始到10月末止，实际一般都在8月中旬左右就收购完了。收购上来的鸦片烟膏，经过工厂加工制造可吸食的鸦片后，再通过工厂送到省、市、县（旗），然后通过管烟所售与瘾者。这样就在东北形成一套完整的鸦片生产、加工制造及销售网，而且是完全在伪政府的垄断、严密控制下进行的。